

司马迁民族思想研究

池万兴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司马迁民族思想研究

池万兴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司马迁民族思想研究 / 池万兴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325-6905-2

I. ①司… II. ①池… III. ①司马迁(约前 145 或前 135~?)—民族文化—思想评论 IV. ①K203②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2315 号



司马迁民族思想研究

池万兴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210,000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300

ISBN 978-7-5325-6905-2

K · 1743 定价: 3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前言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此,如何处理好主体民族——华夏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不仅是历代统治阶级需要认真、慎重考虑和解决的问题,而且是历来史学家们需要认真考虑和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司马迁之前的众多中国古代典籍中,虽然也不乏对少数民族的许多记载,然而,一方面这些记述都只不过是片鳞只羽、凤毛麟角,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另一方面,这些典籍和儒家代表人物,都宣扬“夷夏之辩”,强调“夷夏大防”,《诗经·鲁颂·閟宫》鼓吹“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孔子修《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①。董仲舒虽然鼓吹大一统思想,但由于他对民族问题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和系统完整的认识,片面强调什么“小夷避大夷”、“大夷避中国”^②,认为大夷、小夷不能与华夏诸族平等,甚至小夷、大夷也不能平等,从而陷入了民族歧视论的歧途。

司马迁以其卓越的史识、前所未有的胸怀和宽广的眼界,站

①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八:“‘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内其国者,假鲁以为京师也。诸夏,外土诸侯也。谓之夏者,大总下土言之辞也。”

② 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说:“《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战,大夷言战而不得言获,中国言获而不得言执,各有辞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战,大夷避中国而不得言获,中国避天子而不得言执,名伦弗予,嫌于相臣之辞也。是故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

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适应时代的呼唤和要求,不但第一个认真研究了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和民族关系,批判性地广泛吸收了前人有关民族和民族关系的论述,而且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和主观努力,第一次首创民族史传,在其伟大的史学巨著——《史记》中,详细叙述了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形成了其独特的民族思想:即认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皆为黄帝子孙;主张民族等列;坚持民族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歌颂民族一统与融合;并从探求治国之道的角度详细探究了处理民族关系与经济的关系。从而形成了其卓异前人的进步的民族一统观,开一代先河。

—

1. 司马迁民族一统思想形成的客观基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至春秋战国时,作为我国主体民族的华夏族,已从奴隶占有制社会逐步转化为封建社会。它的上层国家形态,却仍处于分散的状态。当时,周室衰微,周天子名义上虽为“天下共主”,而实权却操于各诸侯之手。春秋之时,政出方伯,五霸递兴,戎狄强于西北,吴越盛于东南,形成争夺不休、混战无止的局面。到了战国时期,在春秋霸权统治和战争兼并的基础上,在中原华夏地区,出现了韩、赵、魏、齐、楚、燕、秦逐鹿中原、争夺称雄的混战局面。七国间的这种相互对抗、争夺,显然只有通过战争才能统一起来,才能结束这种混战局面。这一政治统一的形势,不仅反映着社会发展的要求,也反映着华夏族这个共同体发展的要求。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公元前221年,秦国终于灭掉山东六国,第一次建立起空前统一的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秦建国后,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实现了“诸

夏”的统一。之后又取闽越地,置闽中郡,略取岭南越地,置桂林、南海、象郡;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今陕西西部与河套地区)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又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今黄河以北内蒙地区)^①。这样,秦始皇不仅统一了“诸夏”,而且将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也纳入秦封建国家统一的版图之内,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直接统治。由此,秦的统一,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空前的大统一,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

秦亡汉兴,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大大地前进了。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上下左右互相间的关系密切了,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内聚力。汉承秦制,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继续采取了一系列灵活的经营措施:如根据各民族具体情况,设立政权机构;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建置属国和郡县;在归附汉朝、修职贡、奉正朔的前提下,给少数民族地区的酋长首领以较大的自主权,不改变其原来的政治体制,不改变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等。此外,为了开发边疆地区,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生产,促进其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进步,巩固大一统的局面,秦汉采取了移民垦殖的民族政策和措施。这样,移民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文化,带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移民与边疆各族人民相互依存,互通婚姻,逐渐融合,缩小了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内地的差距,使各族经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进一步密切了多民族国家的内在联系,使各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不断增强。司马迁恰好处于武帝时期西汉最繁盛的时代,他目睹了这一大一统局面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这对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3页。

其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形成,自然产生了最为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2. 司马迁民族大一统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

司马迁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不只由于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大一统局面的出现这些客观历史条件,因为,一方面在相同的时代、相同的客观历史条件下,可以出现截然相反的人物和思想;另一方面,即使时代相同,甚至个性、气质、天赋及学识相同,但由于主观努力不同,也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观点、思想和结果。司马迁民族思想形成的更重要的条件是:他有一个世代相传的史官家庭出身和因此所受的良好教育以及他本人主观上不懈的努力。

司马迁在其《太史公自序》中将颛顼传说时代的重黎氏引为自己的先祖。重黎氏历经夏商,世代职掌天地,周宣王时,重黎氏的后人休甫为司马官,于是这一支便以司马为姓。司马氏世代为史官,至东周惠王、襄王时期,因王室内乱,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在晋国各地定居。公元前 621 年,司马迁祖上这一支,由于晋室内乱,又由晋来到了秦地,迁居少梁,即今陕西韩城。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和张仪同时,曾和张仪进行过辩论,做秦惠王的蜀郡守。六世祖司马靳曾为秦将白起的部下。司马靳之孙司马昌为秦始皇时的主铁官。司马迁曾祖司马无泽做过汉市长,祖父司马喜、父司马谈便是当朝的太史令。

在众家谱中,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自然莫过于他的父亲太史令司马谈了。“谈为太史公。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①。他是一个学识非常渊博的人,曾著有《论六家要旨》,并为《史记》的撰写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司马迁受其父影响,从小就喜欢读书。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迁生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3286—3288 页。

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颂古文。”随父到京师后,他曾拜今古文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等为师,并接受了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随后,司马迁不仅阅读了大量的典籍,对于历史予以详细的考究,而且能够对前人的成果有批判地继承和吸收,继承其合理的内核,而对其荒诞不经或不可信者皆予以舍弃。这种勤奋的精神、渊博的学识以及科学的态度,对其以后的《史记》创作和“一家之言”的形成,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都有表现时代和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代表思想。汉初在吸取秦亡教训的基础上,以黄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经济得到很快恢复,国力逐渐增强。但由于七国之乱的爆发以及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武帝时代,黄老思想明显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在经济获得极度的发展、综合国力得到加强、新生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的情况下,极力想有所作为的汉武帝,已不再满足于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而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理论武器。这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适应时代的需要,成为统治思想。董仲舒在哲学上宣扬神秘的天人感应学说,主张君权神授观点;在政治上主张大一统理论;在经济上主张限民名田,释放奴婢;在思想上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不仅符合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且也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但值得注意的是,武帝时代儒学虽然取得“独尊”的地位,然而,事实上“百家”并未彻底被“罢黜”,而是“百端之学”俱兴,各种学派、学说依然流行。这种学术的繁荣、思想的活跃,使司马迁能够广采百家,兼采众长。他在总结秦亡汉兴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对秦朝的暴虐统治作了无情的批判,但却充分肯定了秦始皇的统一之功,说秦的统一是“世异变,成功大”^①。这种思

① 《史记·六国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686 页。

想便是对贾谊、贾山、晁错、陆贾等人对汉兴秦亡历史教训总结的继承。对武帝时期中央集权的空前加强,天下大治的汉家一统局面的巩固,司马迁也是极力歌颂的。他说:“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繆、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①可见,司马迁看到了历史走向统一的方向,而他这种民族大一统思想的产生,就是在总结历史经验以及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

司马迁不仅阅读了大量的古籍,继承了前人的优秀成果,对历史做了详细的考察,更为可贵的是,为了增长见识,获得第一手的资料,他不辞艰险和辛苦,在武帝元朔三年(前126)二十岁时,进行了一次全国漫游的实地考察。通过这次实际考察,他掌握了大量的、生动具体的第一手资料,订正了许多关于五帝三代的古史传说。这不仅对他后来写作《五帝本纪》、《夏本纪》积累了资料,而且对他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具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这次漫游之后又过了几年,司马迁做了郎中官,这样他便有机会随武帝到全国各地巡游考察。元鼎四年(前113)、五年,他随武帝出巡北方郡县,祭祀五帝,考察了崆峒山。六年,司马迁奉命出使西南夷,代表汉王朝去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迁随汉武帝到泰山参加封禅大典,有机会考察了长城内外,对北方少数民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不仅有助于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对于许多历史问题、民族问题

^①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59页。

有了新的认识,而且对于他后来的民族史传撰写以及民族一统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1. 民族同祖同源意识

司马迁认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皆为黄帝子孙,都是兄弟,是一家人,他们的根是相同的。他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并给他们一一排列了世序。他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嫫祖。嫫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其二曰昌意……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帝颛顼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勳。娶姬訾氏女,生摯。帝喾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帝放勳立,是为帝尧。”而帝舜则是颛顼的七世孙,距黄帝九世。接着他又在《夏本纪》中说:“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这表明夏朝(夏族)也是黄帝的后代。在《殷本纪》中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因而,商人(商朝)的祖先也是黄帝的后代。在《周本纪》中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嫄。姜嫄为帝喾元妃。”可见,周人(周朝)也是黄帝的后代。

不仅如此,司马迁甚至还认为春秋战国各诸侯国以及春秋战国时期被认为是少数民族而予以蔑视的匈奴、东越、闽越等也都是黄帝的子孙,与黄帝是一家人。他在《秦本纪》中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在《楚世家》中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在《越世家》中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

之庶子也。”在《吴太伯世家》中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在《匈奴列传》中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在《东越列传》中说：“闽越王无诸及东越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等等。

其实，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夏周西来和殷自东来，出自夷、羌、戎等少数民族的说法。如《孟子·离娄》中说：“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再如陆贾《新语·术事篇》则说：“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自西羌。”^①至于殷周，其先祖最初可能属于东夷民族集团的一支。而司马迁说匈奴、秦、楚、吴、东越、闽越都是黄帝的子孙，这就更不可靠了。因为中国境内这许许多多的民族，根本不可能出于同一个祖先。司马迁各民族皆为黄帝子孙的说法虽然是不科学的，但它反映了春秋战国以来各诸侯国在互相兼并、相互融合中所形成的那种逐渐趋于统一的民族大一统的政治趋势，是出于对天下一统格局形成的歌颂。

2. 民族等列思想

所谓民族等列思想，并非今天所说的各民族不分大小、强弱，均处于平等的地位并享有平等的权利的民族平等观。在“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传统思想作用下，司马迁只可能站在时代的前列，而不可能超越历史时代，打破封建伦常秩序而形成所谓的民族平等观念。他进步的民族观在于：他第一次打破了“种别域殊”的内外界限，破除了惟我独尊的以华夏为中心的大汉族主义，而视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为一个统一的密切联系的整体，也把中国和其他国家视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在《史记》中，他记

^① 据《孟子正义》注疏：东夷者对西羌言之，则岐周之地为东夷也。此外，陆贾之说不可信。这里引用，只是说明历史上有这种说法，为司马迁所不取，而司马迁的说法是可信的。

述了华夏之外的各民族,如吴、楚、越、南越、闽越以及匈奴、西南夷、朝鲜、大宛等。他把这些少数民族都看作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都置于民族一统的范围之内。认为东南西北各少数民族,都是天子臣民,他们是平等的,他们的历史是走向统一的。因此他对各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如越王勾践、范蠡、由余、南越王尉佗、中行说(见《匈奴列传》)等等予以热情的歌颂。他认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化,对中华民族都有自己的不可忽视的特殊贡献。而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自有其形成的种种经济的、地理的、历史的原因,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无论哪一个民族,即使是先进的民族,也不应以自己的风俗习惯为标准,去衡量、要求别人,轻易把别人视为落后、愚昧而加以鄙薄与歧视。各民族的经济、繁荣与物产交流,对促进汉帝国的繁荣昌盛,对中华民族一统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3. 坚持民族统一,反对民族分裂

坚持民族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是司马迁民族一统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它贯穿于《史记》的始终,特别是在一百多年的西汉历史记述中尤为突出。秦统治时期,中国已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汉立国后,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加强,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有了进一步的坚强,统一的趋势日益发展。但是,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封国林立;二是“四夷”未宾,构成对西汉王朝的严重威胁。因此打击封国割据势力,安定“四夷”是巩固西汉中央集权、维护其一统天下的首要任务。汉初几十年中,统治者采取了削弱诸侯王势力和限制其权利的种种措施。特别是通过景帝的“削藩”和武帝的“推恩令”,使封国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对此,司马迁肯定说:“天子观于上古,然后加惠,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国邑……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齐、赵、梁、楚支郡

名山陂海咸纳于汉。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阨塞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①所谓“强本干而弱枝叶”,即消灭或削弱诸侯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司马迁能明确地指出封国的危害,并称赞“削藩”政策所取得的成果,表现了他坚持民族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民族大一统思想。

汉初,由于连年战争,兵连祸结,经济萧条,满目疮痍,以致“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②。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西汉统治者忙于经济的恢复和打击封建割据势力,对周边民族不便加兵,便采取“安抚”的政策,对夷越采取置国封王的策略,对匈奴采取“和亲”的政策。汉初与匈奴的和亲政策,从高祖始,经惠帝、高后、文帝、景帝,直到武帝初年始终没有改变。“和亲”是在汉王朝政局未稳、国力空虚、敌强我弱的特殊情况下所采取的政策。它以有限的牺牲来换取整顿内政、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积蓄力量的时间。和亲暂时缓和了汉与匈奴间的矛盾,减少了匈奴贵族野蛮的军事掠夺,避免了汉、匈双方大规模的战争,促进了中原与匈奴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使双方形成相互依存、友好往来的密切关系。司马迁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对汉初坚持和亲的四帝给予高度赞扬:“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具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民务稼穡,衣食滋殖。”^③“海内殷富。”^④在这些赞语中,司马迁突出了一个“安”字,国家安定,无杀伐之苦无多徭

①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02-803页。

② 《史记·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17页。

③ 《史记·吕太后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12页。

④ 《史记·文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3页。

役,这乃是发展经济、强国富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

但是,汉初的和亲,并没有彻底消除匈奴对西汉的威胁。匈奴尽管与汉“约为兄弟”,却始终没有停止对汉边的掳掠。为解除边患,从公元前133年到前119年,武帝先后对匈奴发动了十几次反击战,尤其是前127、前121、前119年三次大规模反击战,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司马迁对此在《史记》许多传记中予以详细的记述,并鲜明的表现了他坚持民族团结、反对分裂,歌颂民族间和平相处、友好往来,反对民族侵略的大一统民族思想。在他看来,不管是哪一方,哪个民族,实行民族侵略都是应该受到批判的。

4. 对民族融合与统一的赞颂

周边各民族与华夏族的关系始终是密切相连的。他们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始终是非常频繁的。秦汉之后,随着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出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汉族人们共同体^①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则更为频繁。司马迁在《史记》六篇民族列传以及《刘敬列传》、《韩信列传》、《卢绾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司马相如列传》、《货殖列传》、《平准书》等许多传记中,详细记述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与友好往来,各民族之间的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并对这种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予以热情的歌颂。认为这对促进民族关系、加强民族了解与融合,增强民族凝聚力,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都具有重大的作用。这也是司马迁民族一统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① 人们共同体,亦称民族共同体。这个专门术语最早始用于20世纪50年代初,即1953年在翻译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时所使用。泛指民族、部落、部族、民族等共同体。参见徐杰舜《人们共同体刍议》,载《云南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5. 五体结构的民族一统思想表述法

《史记》的五体结构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形象的体系。它们不仅各具笔法,自成体系,而且又是一个严密的整体。五体结构不仅是一种历史的编纂方法,而且更是一种司马迁民族思想的表述法。它形象地反映了司马迁的民族大一统思想。“本纪”编年,记载天子军国大事,是全书的大纲,“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①。从黄帝到汉武帝,用王朝嬗递和帝王兴替作为科分条析的大纲,以象征历史发展趋向统一的走向。“世家”述开国承家诸侯,“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②,作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列传”叙人臣之事,辅弼君上,如众星之拱卫北辰,以象征君臣之道。从本纪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从《五帝本纪》到《孝武本纪》,司马迁着重表现的是从黄帝的统一到秦皇汉武的统一,象征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方向,也表现了帝王德业的日益兴盛和民族的不断进步。在《秦楚之际月表》中,司马迁十分简略的勾勒了中国历史从虞夏至秦汉大一统发展变化的轮廓。中华民族由分裂走向一统,这就是两千年来历史发展的方向。这一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所以司马迁感叹道:“盖一统若斯之难也!”此外,司马迁《史记》的“微旨”之一虽然是“抑秦”^③,在《史记》许多篇里都揭露了秦的暴政,但对秦的统一之功,却予以高度的赞扬和由衷的歌颂。他赞赏秦统一,正是宣扬他的民族一统思想,也是肯定黄帝和秦皇汉武的一统功业,为汉代中央集权的民族大一统制造舆论。他打破了“别种殊域”的界限,把民族区域纳入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3319 页。

② 同上。

③ 参见钱大昕《与梁耀北论〈史记〉书》,《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四。

统一的封建帝国体系、版图之内来叙述,视各民族皆为天子臣民。这充分显示出司马迁民族一统思想的光辉。而他这种思想,正反映了武帝时代加强中央集权、消灭割据势力、巩固大一统局面的时代要求。

6. 首创民族史传

因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古代典籍当中——不只史书,就连《诗经》、《易经》、《孟子》等文学、哲学著作,都有许多关于我国少数民族的记载。然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为少数民族立传,正式将少数民族纳入中华民族的版图之内来叙述,详细而系统地记述少数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风俗、文化,则始于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为周边民族创立了六篇传记,分别叙述了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等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风俗文化以及他们与中原华夏族及中原王朝的关系。在《匈奴列传》中,详细叙述了匈奴的来源及其活动区域;匈奴的社会政治结构;匈奴的社会经济生活;武帝之前的汉匈关系;武帝与匈奴之战等等。在《南越列传》中,叙述了南越政权建立之前的情况;南越政权的建立;汉初与南越的关系;武帝时代汉与南越的关系;武帝对南越之战及其性质等等。在《朝鲜列传》中,叙述了朝鲜族名、族源及分布;朝鲜政权的建立及其社会制度;汉武帝与朝鲜之战。在《西南夷列传》中,详细叙述了西南夷与中原的早期关系;武帝对西南夷的考察与了解;汉武帝经略西南夷的历史必然性;汉武帝对西南夷的经营策略;汉武帝经营西南夷的性质及其意义,等等。在《大宛列传》中,详细叙述了大宛及其周围国家的政治、历史、经济及地理情况,重点叙述张骞通西域及李广利伐大宛,并对汉武帝通西域的历史意义及作用予以热情的歌颂。这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最早、最完整的记载这些少数民族情况的

著作,也是最可靠、最具有权威性的记述,至今仍是我们研究这些少数民族的发生、发展的最可靠的资料。而司马迁的民族一统思想,也在这些少数民族史传中得到最充分、最完整的体现。

三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主体民族——华夏族与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但由于各民族的历史不同、地理环境不同、风俗习惯不同,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也不平衡。华夏族早在夏商时期已发展成为东方型的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其生产力水平也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而华夏族之外的四方少数民族,有的尚处于“不火食者”、“不粒食者”的极为落后的部落状态。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相当落后。由于这种不平衡现象的客观存在,因而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尊华夏而贱夷狄的民族不平等观念。中原华夏民族被称为“冠带之邦”、“冕服采章”,是“礼义之邦”,而四方民族则被称为“蛮荒之地”。

这种歧视少数民族的观念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十分普遍。《诗经》中说:“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尚书》说:“蛮夷猾夏。”《国语·周语下》说:“夫戎狄,冒没轻儻,贪而不让。其气血不治,若禽兽焉。”孔子修《春秋》,其主导思想之一便是“内诸夏而外夷狄”。他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①战国秦汉之际,虽然华夏民族的民族优越感和蔑视少数民族的观念依然十分明显,但随着政治上大一统局面的出现,人们的一统意识也有所增强。司马迁适应大一统时代的需要,慧眼独识,独步史坛,在其

^①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八佾》,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2页。